

# 老舍辟谣

周惠斌

“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我特别喜爱图画。”作家老舍创作之余酷爱名家书画，尤其喜欢齐白石的作品。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老舍并不认识齐白石，因此也无缘得到白石老人的画作。

1933年，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时，因为给好友、作家许地山帮了点忙，事成后，许地山问老舍：“我要送你一点小礼物，你要什么？”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一张白石老人的画！”老舍知道，当时许地山住在北平西城，离齐白石住的跨车胡同不远，而且他们颇为熟悉，时有交往。在许地山的热心牵线下，齐白石画了一幅《雏鸡图》，题款“舍予先生清属，癸酉春二月，作于旧京寄萍堂上，齐璜”。下铃“白石翁”白文印。当年，白石老人的润例为60元，因有许地山出面，老舍仅付了30元润资。画面右上方，一只鸡窝，笼门已打开，17只小鸡飞奔而出，分布整个画面，笼内仅剩下一只小鸡迟迟不愿出来……毛茸茸的小鸡活泼可爱，栩栩如生，它们体态各异，或前或后，或右或左，或正或侧，或单独或三五成群，错落疏密、浓淡相宜，堪称白石老人的精品力作。

老舍收到《雏鸡图》，大喜过望，托人精心装裱后，在画轴题签上郑重写下：“白石翁雏鸡出笼图，一九三三年，老舍。”逢年过节，总要拿出来张挂几天，细细品味，钟爱有加，视若珍宝，甚至表示，即便有人拿宋徽宗的画来换，他也绝不同意，因为“这是我最钦佩的画师所给，而又是好友所赠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于1938年离开济南，只身南下，奔赴武汉，以文艺为武器投身抗日大潮。他嘱咐家人：“什么东西都可放弃，这张画万不可失！”妻子胡絮青回到北平，在师大女附中教书，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不久，在朋友推荐下，她来到齐白石家，辅导其四子、五子报考辅仁大学。胡絮青教课认真，齐白石很是欣赏。齐白石曾为胡絮青画了一幅2平方米尺的《虾蟹图》（润笔费400元，画面上6只虾高低参差，身体半透明，几欲游出纸面。右端题款：“青女士清属，庚辰六月，白石老人”，下铃“齐大”朱文印。

1943年秋，胡絮青携舒济、舒乙、舒雨三个孩子，并带了《雏鸡图》《虾蟹图》，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北碚与老舍团聚。再度看到齐白石的画作，老舍高兴至极，将它们挂在蔡锷路上的自家客厅里，顿时蓬荜生辉。老舍家里有两件齐白石画作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文艺界的朋友们纷至沓来，一睹为快。不料，消息传来，最后竟成了“老舍夫人带来了一箱子‘齐白石’”“老舍成了富翁，发了横财”等言语，愈演愈烈，几成谣言。

老舍哭笑不得，1944年1月7日，他在“头昏斋”书房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自嘲道：“假若我真有一箱子白石的画该多么好呢！一箱子！就是二尺长、半尺高的一只箱吧，大概也可以装五百张……想想看，以二千元一张画说，五百张该合多少钱？”他不无调侃地遐想，自己若真有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就重庆“开一次展览会，一来是为给我最佩服的老画师作义务的宣传，以示敬意；二来是给大家个饱眼福的机会。在展览的时候，我将请徐悲鸿、林风眠、丰子恺诸先生给拟定价，标价出售。假若平均每张售一元吧，我便有五百万元的收入。收款了以后，我就赠给文艺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音乐界抗敌协会各一百万元。所余的一百万元，全数交给文艺界救助委员会，用以救济贫苦的文人——我自己先去申请助金五千元，好买点补血的药品，疗治头昏。”文末笔锋一转，建议大家：“请去北碚，还是看一看我藏的十八只鸡窝和肉人的六只虾吧，你一夸奖它们，我便欢喜，庶几飘飘然有精神胜利之感矣！”

文章后来发表在1944年2月11日《时事新报》上。老舍诙谐幽默，谈笑间不仅将造谣者挖苦了一番，还以春秋笔法，揭示了陪都文人清贫、困顿的窘迫生活，一时传为佳话。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 学林一叶

更充分。目前大家看到的还只是第一卷，即1905年至1913年的内容，叙事区间是同盟会成立到“二次革命”失败。

记者：写《孙中山与海南》有什么样的收获？

钟业昌：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说书中的史料百分之七八十是首见，这也是令我感到震撼并深受鼓舞的，所谓“痛并快乐着”，大概就是这样。我想研究的难点问题、想要寻找的佐证史料，基本上都能得到。据此，我已解读1912年的“琼州改省案”始末，接下来我还要还原1914年的“林文英案”和1917年的“陈侠衣案”，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关于清末民初那段海南历史，现在看到的书籍、文章非常多，但大都互相传抄，而且大多抄自随国民党败逃到台湾的海南人写的书，如澄迈人王家槐撰写的《海南近代人物志》等，且都不注明出处，鲜有亮出第一手材料者。由于掌握史料有限，一些作家、专家的写作就露出短板，留下遗憾，这些我在书中都有所指出。

写作过程中，我基本上是拿出曾经的“新闻人”的基本功（见人、见事、见精神），去“挖地三尺”，大量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使用，让我兴奋不已，欲罢不能，也使我对海南那段历史有了很多的新发现。

记者：写《孙中山与海南》得到什么启示？

钟业昌：《孙中山与海南》这套书，总体上是再现孙中山从出生到逝世几十年间的生活轨迹，以及与此相关的海南人民的苦难奋斗史，这方面的启示，正如该书腰封上提炼的文案“鉴往知来：经略一岛，关乎全国”。

孙中山经略海南的三大历史贡献（琼州革命、琼崖改省、海南开发），对新时代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说，海南自贸港建设要联动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双向而行；推动琼州海峡、北部湾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这在孙中山的思想中都可寻得脉络。

甚至可以说，孙中山不但1912年就有“留意琼岛”之举，到1921年更有“将举岭峤，为天下则；宜先治琼，为粤矜式”的理想，这与当下“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的浩荡大势，都是前后辉映、震古烁今的。

作为作者，本人希冀读者借由阅读《孙中山与海南》，能回到觉醒年代的琼崖场景，更加深刻地感受“鉴往知来”的历史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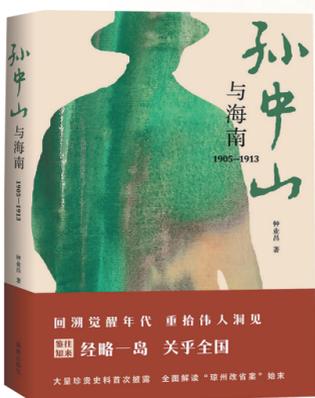


王斧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也是第一位加入同盟会的海南人。图为1940年的王斧。

本报记者 陈耿 翻拍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书影。

记者：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或原动力，促使您写《孙中山与海南》？

钟业昌：我是在写《宋君耀如》时，留意到孙中山的生命历史的，这应该有20年的时间了。

我从大量史料研究中发现，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宋耀如，就没有孙中山；没有孙中山，也不会有宋氏家族。因此，写宋耀如时我是花很多时间来研究孙中山的。

在此过程中，我完全跳出宋耀如、宋氏家族来专门写孙中山与海南，是因为看到孙与宋的关系，纯粹是他与一个在外闯荡的海南人的关系，与海南本土的人与事没有任何关联、交集。

这样，我把目光转向海南本土，发现那段历史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可谓波谲云诡，风狂雨骤，而孙中山是那些纷繁世事变化的源头，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海南诸多的人与事都是随着他的命运沉浮而“移动”，或喜或悲。如果不从孙中山写起，根本无法说清清末民初那段历史变幻中的海南人与事，还有当时真实的海南社会面貌。

还有，作为一位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大人物，孙中山是我看到的影响海南历史进程绕不过的重要人物。我有一个“六开”海南的认知，即在2000多年的海南历史时代，概要说是开郡、开化、开辟、开发、开放、开港的历史过程，而倡言开发海南的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海南历史需要大书孙中山一笔。

记者：《孙中山与海南》这套书写的究竟是什么？

钟业昌：这套书写的是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25年孙中山去世的整整20年间，孙中山与海南的人与事，以及那时的海南社会面貌，就是



前排自左向右分别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四人过从甚密，经常聚首抨击时政，主张勿敬朝廷，被谑称为“四大寇”。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出版社提供

清末民初海南的历史轮廓，主要分三个层次。

一是以“人”而言，是革命者与治琼者。

革命者是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除了海外的王斧、林文英等琼人群体，本土主要是以陈侠衣、陈继虞、徐成章等为代表的“民军”（起义军、讨袁军、革命军、讨贼军等），他们在讨袁（世凯）、讨龙（济光）、驱桂（旧桂系）、驱邓（本股）诸役中，不断抗争，屡创反动势力，并一直坚持到孙中山去世，连续激荡琼崖十几年。这一幕幕，也可说是琼崖共产党组织诞生之前，海南人民的苦难斗争史。

治琼者方面，既有孙中山的支持者，更有他的反对者。像早期的黄明堂、古应芬、邓铿等都是孙派，但他们在海南的时间都很短；而像龙济光、邓本殷等是典型的、势力较大的反孙派，他们盘踞海南时间较长，尤其是邓本殷，有六年之久，他们的蜕变与反革命、反人民，我都会在书中做大量独家披露与分析。

二是以“事”而言，主要是革命、改省、开发三件大事，是孙中山经略海南的三件大事。其中，琼州革命，贯穿孙中山生命的最后20年；琼崖改省，孙中山曾经推动三次，直到逝世；海南开发，出现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在他身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以宋子文1936年返乡为显著标志。民国开发海南之浪潮，实与孙中山有莫大关系。

三是以“社会”而言，琼崖当时的社会面貌，是上述人与事相互作用的社会现象，总的来说那时的海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书中通过当时的名人游琼见闻，对此给予场景式反映，让今天的读者明了彼时的琼崖社会是多么黑暗。这点在第二卷、第三卷中会反映得

# 鉴往知来 寻迹孙中山与海南

本报记者 陈耿

- 第十章 鼎革之际
- 第九章 改省张本
- 第八章 琼州改省案
- 第七章 留意琼岛
- 第六章 未代琼崖道
- 第五章 图海南
- 第四章 千年一叹
- 第三章 榆林军港
- 第二章 在南洋
- 第一章 风起同盟会

编者按

4月23日，第29个世界读书日，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主办的“回溯觉醒年代，领略伟人洞见”图书沙龙活动暨《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新书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是第一部讲述孙中山与海南故事的原创图书，其填补了相关出版领域的空白，挖掘了孙中山与海南的渊源、孙中山对海南的关注及其与开发海南的联系，重点讲述孙中山和追随他的琼籍志士的革命友谊，他对海南革命、改省、开发的先见，他对海南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牵挂，他在中国革命洪流中团结引领广大海南革命者同心奋斗的革命经历和重大贡献。

这只是孙中山与海南“三部曲”的第一部，《孙中山与海南1913—1920》和《孙中山与海南1920—1925》的写作也已接近尾声。为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海南省史学会会长钟业昌先生。

## 《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

篇章目录

就时间属性来说，历史是过去，而且是不可逆的过去，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必然充满、隐藏着无数的不为人所了解的秘密。同时，昨日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的，昨日的影子无时无刻不投射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生活在今天，就必定不可以忘记昨天。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现实，就必须要看清过去，知道其来源，方可追寻其过程，再预见其未来。寻找历史的真相，作为历史学的目标，其过程必然是艰辛的。然而，为了更准确地描绘历史，以预见未来，古来贤人达士莫不惮艰辛，志在复原史实的原貌，寻找历史的真相，期于解开历史的谜团，找到历史变化的规律。窃认为，眼前钟业昌著的《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就是上述目标的最好例证了。

通读《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一书，感触颇多，其中较大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中有颇多的海南历史事件的

新发现。海南原属广东，在清末时期，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广东都是全国的先行者，而在此氛围下，属于广东的海南，也是呈现着先行者的特点。辛亥革命诸多起义中，广东的起义影响最大，其中颇多海南的杰出人物，如张云逸等就活跃其中。同时，其他海南人物也很有建树。是书发现王斧在1905年底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之时即加入同盟会，是海南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他也是革命党中文胆式人物，与当时陈少白等党人联系密切。

其二，此书纠正了目前海南史书中的一些错误。历史研究就是求真，历史描绘不真，历史规律不会显现，欲求治理天下的良策，如同缘木求鱼。海南历史上，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相，在以往的记述与评论中，颇多欠缺，很是影响我们对海南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如此书注意到一个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当时的广东革命党人黄明堂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名人，也是

# 揭示历史真相 探寻史实原貌

张兴吉

孙中山先生的积极支持者。作者进行研究认为：不可否认，其任琼崖宣抚使时期，他所率的民军为琼崖，以至于民怨沸腾，他本人也不得不“被贬”，离开海南。另外，作者指出了著名的海南历史名著《海南岛志》中有一个错误，这就是《海南岛志》记载民国初年时的“琼崖绥靖处副处长李福隆”（处长是古应芬），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李福隆是民国初年雷州的悍匪，其部众后在海南被剿灭。《海南岛志》中的“李福隆”，实际上是后来的粤军首领李福林，李氏虽也是绿林出身，但很早就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两个人性质、贡献不同，绝不应该混为一谈。

其三，是此书对海南历史重大事件的细致描绘颇有成效。历史的真相，只有在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中，因为只有这样细节的关联，才构成了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海南近代史中，很多的历史事件的细节是有些不清楚的，本书加以仔细描绘，很

是可贵。清末辛亥年（1911年）的“学生军”攻打府城之役，史称“范赵冲突”，其事发生于清宣统三年十一月月初七日，即1911年12月26日，这个时间点，著名的“南北议和”已经在南京召开。因此，“学生军”进攻府城的冲突，已经不全然是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活动，而是还夹杂着个别团体的私利了。或是因此等私心，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总之导致海南在辛亥革命之后，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致使此后十多年来，海南在大小军阀控制之下，经济社会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真实的史实，往往隐藏在往昔的故纸堆与弥漫的历史观中，所以想要揭示历史的真相，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艰苦的探寻，没有精神的消耗，是无法实现的。

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的所得或许是有限的，但是形成一个群体，众人拾柴，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东坡书院院长）